

策決的洲亞

譯合 風未曹
棋棋尊劉

著爾摩鐵拉·美



行印 社版出外中

B3
1

亞洲的決策

著爾摩鐵拉·美

風未曹
譯合棋尊劉



中國對外出版社印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





2817780

亞洲的決策 目錄

第一章	亞洲在戰爭和政治中的重要性	一
第二章	日本帝國主義	一九
第三章	中國國民革命及民族主義運動	三七
第四章	中國的政黨政治及對日戰爭	五九
第五章	戰爭，地位及政治	七六
第六章	吸引的政治	九一
第七章	安全的政治性	一二
第八章	一個美國對亞洲政策的要點	一二九

第一章 亞洲在戰爭和政治中的重要性

在這次戰爭之中，我們到達了一個把歷史分爲兩大時期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背後一切景象，我們業已經歷過來，多少爲人所熟知，從而我們常稱這次戰爭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別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分水嶺前面的遠方景象，在人們感覺之中卻還是未知之境，因此對於未來總抱有深刻而且常常是疑慮的關懷。

這次戰爭之所以構成一個分水嶺，是由於亞洲的重要性。幾百年來，亞洲這個區域，它的幾萬萬人民的政治歷史和經濟命運都決定於亞洲以外別的地方所發生的事物。我們現在卻跨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時亞洲所發生的事物。在亞洲所形成的意見，和在亞洲所做的決定，反而大致決定着世界各地事態的演進。

我們能否放眼看看分水嶺的彼方，觀察未來，大體要看我們對亞洲有無充分的知識和對運用自己的知識有無充分信心，猶如測量員運用他的儀器那樣，以爲定。倘若我們覺得亞洲的事情到底和賽馬會的事情差不多，那麼到了戰爭結束之時，我們所玩的仍不過是些政治把戲，將我們自己的未來當做一場大賭博來處理，我們的機會就荒廢了。

珍珠港事變前，住在亞洲的美國人都處於一種特權的境地，不是殖民地的特權，就是依據條約在中國享有的特殊利益。在亞洲的美國商人簡直用不着跑出去兜生意。他們舉足輕重，大可坐待生意送上門來。在政治上，呈請的人總是亞洲人；美國人在生活上除了接受一些呈文，批駁另外一些呈文，再把別的一些轉呈上峯之外，用不着更敏銳的政治觀察。這種生活是不會把職業的外交家的頭腦用力發揮出來的。

即使在日本，外國人也是陶醉在優越感和便利感中的。日本人不甘居於次等地位，卻不會有充分力量公開向這個世界秩序挑戰，乃不得不在長期歲月中祕密經營，準備時機一到就用武力建立他們的「東亞新秩序」。雖然在一九三一年到珍珠港事變這個期間，日本人這種祕密已經逐漸顯露出來，可是他們依然無所忌憚地進行不輟，因為大多數專家們固執着一貫的想法，已經養成一種透過磚牆看東西的怪異技倆，而不想透過玻璃看東西。

美國人不諳習亞洲各種語言，就是美國專家們對亞洲知識淺薄的一個好的例證。反過來說，亞洲人諳習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便有許多利便，這件事，就是美國人享受特權地位的好指標。青年美國人除了學會一點中國話，日本話，馬來話，或洋涇濱英語，吩咐聽差比較方便之外，用不着學習什麼，他們升遷並不在乎他是否學會一種語言以便充

分理解中國、日本、爪哇或印度商業實際活動內幕。一般都認為：反正當地的「土著」商人會布置好每一件生意，到成熟後讓外國人來交接。那時他自會送到外國人那裏去，用英語辦最後的詳細交涉。

在外交場合，用一種亞洲語言談判是罕有的例外。有一些青年外交官，陸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軍官，是應該學會一種亞洲語言的，但很少在社交中說成習慣。甚至閱讀和摘錄當地報紙大多都假手於本地的書記。你要找到一個新聞記者能用一種亞洲語言訪問，或閱讀當地報紙，或當成習慣來在日本、中國、或印度內地到處旅行，那真是個例外。大多數教會人士所做的事都是把一些西方的特殊事物解釋給東方人知道。當他們把東方向西方解釋時，他們自然而然只是強調那些顯然需要更多金錢進行教會工作的事情。關於亞洲政治乃至歷史的最有影響的書，許多作者並不能閱讀原文資料，而他們硬要以權威腔調議論這些人民的事情。

人們常常會聽見一個「專家」發表演說或文章，將中國描寫成軍閥、鴉片、揩油、小老婆、共產黨的混亂局面，以及胡亂侵犯外國權益的所在。也許一星期後又有一篇演說或文章，描寫中國人是怎樣講民主的國民，上面有一幫忠誠而聰睿的政治領袖，他們在其他事情之外，正準備着一個美國企業和利潤的無限制的園地。凡是見聞過這種情形

的美國人不妨回味一下：當時他對這些相互矛盾的「專家」們的相對的專門性，能有多麼可靠的判絕標準呢？

辛亥革命時，大多數美國專家（當然也有歐洲人在內）強烈主張共和政府絕對不適宜於中國人。中國人只知道皇帝。他們所要的，無非是一個穩定的政府，——一種家長制的政府——法律，秩序與合理的捐稅而已。北洋軍閥袁世凱被這般人描寫為正是中國需要，中國人所能理解的一個有力人物，孫中山則不過是一個和藹可親但不務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不然便是一個輕舉妄動的幻想家。在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前，國民黨是給形容得像一夥不可管束的人們，被布爾塞維克主義赤化了，專門掠奪外國商業，自己什麼都創造不出來似的。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分裂而與外商妥協以後，共產黨又被描寫為一羣吸血的暴徒，一方面全受俄國人的煽動，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生活中既無根基又無地位，好像只要將必要的軍火和飛機供給中國政府，它就可在一夜功夫滅絕他們似的。這個一夜便可滅絕的工作，進行了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同年，日本人經過多年的侵略之後，對中國實行「最後的」攻擊，於是絕大多數的專家們又一口認定日本人在三個月內便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這只是一個極簡賅的記載，但至少有一點似乎是明白了。美國的「專家意見」是如

此之不稱，甚至每每大多數專家意見若一致，他們必定是錯誤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都異口同聲強調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放心相信他們嗎？至於日本問題的美國專家的真像，那是更難了，我們要在下一章中加以考慮。

◎ 把我們自己的無知和混淆完全歸罪於專家，當然於事無補。事實是惟有社會公衆責成專家，實事求是，纔能造成一種競爭，使好的專家露臉，使壞的專家丟臉。各種討論會都喜歡別人把事情告訴他們，很少用他們自己的腦筋構成獨立的主張。但將一個專家所說所寫的編纂起來，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將一個報紙的言論政策和判斷的經過加以編纂，顯示出它對歐洲和亞洲問題注意的比重，它的正確和錯誤判斷的比較，以及它的國內與外交政策的關係，這也同樣是容易做到的事。參議員、衆議員、和國務院的言行也可以同樣方法編纂起來。如果大家本身已經做到了這些準備工作，專家們不能信口開河，那麼我們不久就會有比較好的專家了。

以上這些懷疑和批評性的緒言，不得不說在前面，冀求掃清我們認識的障礙。我在本書中並不侈言亞洲內部有什麼玄奧神祕之處，非照我的話相信不可。我的一般假定是：凡能懂得任何其他問題的人也都可以懂得亞洲問題。這裏有些意見和別人的意見不同，但這些意見的理由是很明白的，而且陳述的方法是訴諸理智，不訴諸信仰。

不幸，美國人理解我們所要理解的問題，有若干障礙。一個大障礙是我們的習慣把歐洲放在一切念頭之上。我們若把政治思想轉移到非洲和亞洲，我們的習慣仍是從歐洲方面想過去。中立法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是一九三九年通過的，起草的人腦海中都只有歐洲，以為需要法律約束以免美國捲入其中的，只會是歐洲的戰爭，不會是其他。當這種想法盛極一時的時候，恰好又有很多人以為事態的自然發展會變為德國日本分別從兩方攻擊蘇聯，這就是一種典型的矛盾。換句話說，在亞洲方面的日本，總被視為次要的因素；在歐洲方面的德國為主要的因素。一九三九年七月，歐戰爆發前兩個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曾勸告國務院廢除日美商約，李普曼把這一件事稱為「難以置信的荒唐舉動」，正是由於這種想法所致成。因為這一舉動，乃「使日本警惕到我們已成它的死對頭」。而這同一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同一月內，又做出決定「拒決解除軍火禁運令，以致英法無法從這裏（美國）購買軍火抵抗德國——那個自一九三六年起就和日本結為同盟的德國！」李普曼的意見是：「這樣完全沒有能力指導一國外交的現象，是難以找到比這更好的例證了。」

當然這是事過境遷後纔容易看出來的。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李普曼自己雖然是一個反對德國擴張的人物，卻未能理解到要想制止德國，必須也要制止日本。一九三八年

底，當日本同時佔領漢口和廣州時，他居然嚴肅地說日本已經打勝了，在中國的戰爭。

一個諳知内幕情形的官方機關和美國見聞最廣的國際問題評論家，對於政治形勢既有如此重大的誤解，則徒徒怨尤以往的過失是於事無補的。這一類的過失往往並不是單純的固執或有意的曲解的結果，勿甯可能解釋為構成社會一部分人的特點的許多個人在他們的態度上，想像上和思想習慣上的表現。從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犯滿洲起，經過希特勒的登台，義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法西斯之推翻西班牙政府，慕尼黑協定之出賣捷克，歐戰之爆發，以迄於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變——在整整十年之間，美國人優柔寡斷，一錯再錯。每逢一次危機，我們都游移在錯誤的方向，從來沒有走到正確的方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思想中支配着其他一切的事實是：美國參加了並且決定了一個歐洲的戰爭。並且當我們和國際聯盟背道而馳而與哈丁總統「重返承平之世」時，我們一般民衆都覺得美國將好逃出了歐洲以及紛擾。

所有舊日的假定和思想習慣都隨着這個戰爭的結果而益愈燃熾起來。歐洲越發變成丁涉及孤立主義與自給自足思想和討論的焦點，至於世界其他各地的事情盡可不接觸，不捲入。人們以為：一個問題如果可以照歐洲的辦法行得通，則在世界各地都行得通。

如果照歐洲的辦法行不通，則用什麼辦法也行不通。

我們在談判和推行政策之中，正如在辯論和思想中一樣，都是以歐洲做中心的。在凡爾賽會議中，本可對付日本一下，以免集中於歐洲問題，然而不此之圖，反把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怨言加以抹殺，聽令中國退出會議。

美國人現在若反顧一件事情是很有益處的，就是：全般說來，日本的蹶興是受到美國政府政策和美國輿論的垂青的。美國的國策一向是受了一種考慮的影響，即中國的殖民地瓜分前途還沒有過去。美國所需要的是在中國有自由競爭，而不是把中國領土分割成若干獨享的殖民地。一八九九年的門戶開放主義就是爲貫徹美國政策而設的。

這是一種「分我一杯羹」的主義，雖然它連提都沒有提到機會的均等。美國不願要中國分裂開來，深怕那些在中國業已獲得殖民地所有權的國家會銷售它們自己的貨物，投入它們自己的資本，而損及美國的企業。美國那時雖然已有實力參加差不多任何經濟角逐，可是還未把握定何種活動對它最關重要，因此，它希望別的任何國家都不要獲得那些在將來會防止美國利益之加入與發展的權益。不過，那時某些「勢力範圍」已在中國建立起來，卻是不得不承認的。美國的舉措旨在避免勢力範圍之進一步的發展，對於業已劃定了的，並無取締的企圖。

門戶開放是美國多年來在中國所行政策的一貫發展，並不是另闢蹊徑。過去美國從不要求在條約口岸取得租界，正如它在一八九九年不要中國被瓜分一樣。「租界」就是中國政府在條約口岸交讓給外國政府的一塊地方。在租界裏，外國國旗到處飄揚，外國政府有其自己的警察和法庭。此外還有一兩個「租借地」，並不是交讓給任何單獨的外國政府的，而是國際性質的。美國公民居住在這些租界和租借地裏，和其他外國人享受同等的權利和特權，包括受美國法律的保障在內。美國認為這種對中國的侵凌不應該再加以擴張，但我們卻又認為無論再對中國有什麼進一步的侵凌時，美國人有益均沾之權。一直到珍珠港事變為止，我們都在這帝國主義時期的機構中自由運用。前美國駐日大使格魯的所有文牒和日記都顯著證明我們官方興趣所在，無非是日本不管迫令中國簽訂什麼協定，皆不得減削美國已有的特權或排除美國於未來機會之外。

還有，我們總要記住，門戶開放是一種英美共同政策。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有一種頗為普遍的傾向，以為英國是約翰·海氏所「制止」的國家之一。其實海氏的文牒是後來出任美國駐中國公使的羅克希爾所促成的。羅氏是海氏的朋友，和英國當局過從甚密。門戶開放宣言中很多措辭都是叫做希匹斯里的英國人的手筆，他曾在控制中國海關的國際的（但以英國為主的）官場任職。解釋是英國在中國據有最強有力的地位。他們寧願

中國在一種國際特權制度之下受着剝削，運用各種花樣，例如條約口岸，治外法權，海關控制權，砲艦航泊在中國領水和在長江上下游行駛權等。如果大家都公用角逐在中國的殖民地所有權，則英國定會攬得最大的一份。因此之故，英國一鼓勵美國推行門戶開放政策，並全力支持它，大勢便決定了。

誰知道在英美這種「分我一杯羹」的主義底下，却暗暗中留下一個大漏洞，使我們反對日本侵凌中國的立場根本爲之削弱。在我們所有向日本提出的抗議中，英美從未駁斥過日本向中國提出要求的權利。

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當日俄戰爭之時，門戶開放主義只有短短幾年的歷史，還未達到充分的權威和穩定的程度，難免有隨時被推翻的危險。除了俄國，所有列強都離中國相當遠，只有海路可通。在他們爭相剝削中國的競賽中，相互同意一些「規章」是比較容易的。唯有俄國與中國陸路相接，所以始終潛存着一個危險，即俄國會以陸軍造成一種歐美海軍無法對付的形勢，致令全盟規章爲之推翻。

在這種形勢之下，乃有一種感覺，就是日本或可發展成爲一隻對付俄國的好的看家狗。一個好的看家狗當然有權在南滿（俄羅斯的大門口）盤據一個好狗窩，儘管南滿是中國的領土。美國輿情是擁護這種國策的，因爲他們認爲日本是一個有用而絕無危險的

國家，因為沙皇從不爲美國所歡迎，而沙皇流放政治犯到西伯利亞的作風斷非美國人所贊許。因此，修多爾·羅斯福很容易出馬擔當日俄談判的斡旋人物，而軍事勝負雖未完全定局，樸資茅斯條約竟使日本比它理應得到的還更有條件。

美國情願給予日本特殊方便，這種意念，到一九一七年蘭辛——石井換文時，登峯造極。蘭辛的照會中有一段說：「美國和日本政府承認：國與國間如有領土接壤便發生特殊的關係，職是之故，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尤以和它的屬地連接的地方爲然。」不錯，在一九二三年，「由於在華盛頓會議所成立的諒解」，上述蘭辛——石井的協議已被廢止，「不再有任何效力」，不過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到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件期間，許多以與日本通商爲有利可圖的美國人，依然替日本強辯，說日本由於和中國領土相接之故實應享有特殊利益。

華盛頓會議有四個主要的結果，需要加以簡要的詮釋：

一、英國廢除英日同盟。這事表示：歐洲問題假定已告解決，此後實力應由歐美方面向亞洲發揮，而不應從亞洲內部過於強大的根據地發揮出來。這事解除了美國一種深刻的_一不安，就是擁有亞洲灘頭陣地的日本，和除開這個同盟之外在政策上很久以來就與美國比較接近的英國，兩者之間的同盟所引起的不安。

二、日本退出山東。這事重行肯定了一種設想，即以爲日本正當的使命（除在滿洲外），只能在英美所主導的一串條約，特權，統制，保障的體制中佔一個次要的伙伴地位，而這一套體制，有一部分是把中國恭維起來的，有一部分是把中國鉗制下去的。日本不應該建立短距離的管制，而干涉英美長距離的管制。

三、英、美，日同意不在若干戰略地點設防。這是依照日本的要求而行的，並且是日本爲廢除英日同盟而討的價錢。

四、海軍比率規定爲美國五，英國五，日本三。英美的算盤是：日本的比率既小，自不能從那太平洋的角落中揭竿而起，同時英美也不能有充分的力量輕易冒犯日本的內海。日本的算盤是：英美自會履行上述，不設防的諒解。事實上，日本一面祕密設防根據地，一面巧妙地運用它的海軍，竟能建立起一種潛在的攻擊能力，根本推翻了五——三比率的用意。

俄國雖然在亞洲和太平洋都擁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卻未被邀參加華盛頓會議。這種排蘇行動中有兩個想法：

一、蘇維埃不會持久，關於俄國在亞洲和在太平洋的地位，只應該和將來取蘇維埃制度而代之的政府討論。

二、俄國也像日本一樣，應當防範，不可使它對於東亞從地理的近距離內發揮有害於英美遠距離的世界強權制度的影響。

在思想和本能的行為上都從這兩種想法出發的一代人物，不會產生一羣真正能向美國公衆解釋亞洲發生的一切事物的專家，自不足怪。我們關於亞洲的想法，還是基於十六世紀初期偉大的航海時代，那時長途的駝運路線，將將被海上航綫所駕馭。我們依然把亞洲分爲近東、中東、印度、西南亞、遠東。我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在習慣上總想着經由不同的海路到達亞洲各部，並且因爲貿易，殖民地的征服，和政治勢力之間以上每一地區擴張，都是從它們各別地區的海岸據點出發的。

我們現在不應該把亞洲看做若干由海路乃至空路通達的分散地區，而應把它當作一個廣袤連貫的地區，在那裏將來公路、鐵路、航空的交通，工業生產，分配和消費，都會大規模發展起來，就是北美也不能凌駕其上。

老的公式只代表一個方程式的一半，它只表現一個歷史的陳跡，表現那些舊日的因素在新形勢中所繼續起的日漸無力的作用。爲了完成這個方程式的新的一半，我們必須努力擬製一種公式，以便在全世界。最長的陸路國境綫——從海參崴以迄黑海綿延幾千英里的國境綫上，都可適用。

這個國境綫的一邊，只有一個國家，就是蘇聯；但是它的一些最重要的聯邦成員，那些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外國領土毗連的蘇維埃共和國，最近已獲得了單獨派遣外交使節和行動之權。這些聯邦共和國的人口，雖然同樣是蘇聯的公民，但在種族上，語言上，和文化上與俄羅斯人不同，而且常常與蘇聯接壤的非蘇維埃國家保有密切傳統的關係。在這國境綫的另一邊，有着許多完全不同的國家，擁有不同的人民和文化，但它們中間每一國也都和蘇聯人口中的或一部分有語言上或其他的聯繫。

在亞洲腹地，蘇聯的亞洲邊疆，和亞洲的許多沿海地區之間，產生了一個新的均衡，這並不是一個靜止的均衡，而是力量的平衡，一時維繫不墜，隨時卻有變動可能。這個均衡是幾種主要力量造成的：

(一)帝國主義的殘存力。我們已然有權希望帝國主義時代成為過去，意思就是說，帝國主義再也無力作領土的擴張。不過，帝國主義的退縮是不平衡。在殖民地世界的若干部分，它退縮的程序比許多人所希望的要慢得多。不但如此，即使在帝國主義的機構已經解體後，帝國主義的若干歷史作用還會繼續到很久很久。

(二)西方民主的擴張，這是與資本主義思想以俱來的。有些國家會很快地採行民主的政治機構。還有一些會受到民主思想的強烈影響，採行其政治機構却來得很慢，或